

# 故宫文物南迁往事

周乾



图1



图2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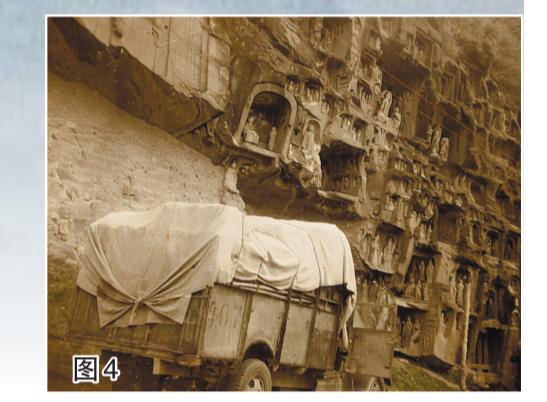


图4

故宫博物院拥有数量众多、极其珍贵的文物。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形势岌岌可危。为避免日寇掠夺或破坏文物，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部分文物迁离北平。1933年2月起，故宫文物运往上海、南京，并在南京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分院。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存于南京的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诸省迁徙，此举又称南迁过程中的“西迁”。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的文物回到南京；除部分文物于1949年运至台湾，其余大部分文物于1951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间，故宫博物院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可能地举办展览。上述文物的迁徙过程，被称为“故宫文物南迁”。

## 一、文物起运

关于文物装箱起运，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从经济、安全方面考虑，打算用装纸烟的旧木箱，用旧棉衣、棉被拆下来的黑棉花衬垫，请古玩行业里专装出口文物的工人装箱。这种做法，遭到了包括那志良在内的大多数职工的反对。于是，他们找到时任院长易培基，提出了三条意见：旧木箱装文物很危险，他们无法保障文物安全；旧棉花没有弹性，而且对人的健康有影响，主张改用新棉花；装箱工人没有什么技巧，他们不需要装箱工人，可以自己装文物。易培基被说服，随后对文物装箱提出了改进建议：把旧木箱交给了图书、文献两馆，用于装书籍、档案；规定新箱子的尺寸一律为长三尺（约1米），高宽各一尺五寸（约0.5米）；并规定棉花一律采用新棉，所有的装箱工人一律辞退，改由故宫博物院的人自己装箱。

关于文物装箱的安全措施，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以瓷器为例，回忆了文物装箱秘诀：在于一个“紧”字。他们看到以前江西景德镇进贡的瓷碗，装在木桶里，每10个碗用草扎紧，成为一组，每个碗丝毫不动。再把若干组碗放入木桶中，每组碗之间，用谷壳塞紧。当年通过这种方式运到宫里的瓷器，没有一个破碎的。他们参考了这样的经验：把每件瓷器用棉花隔开，分别包扎起来，再放到箱子里，就不会破碎了。

从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共5批。第1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2月6日，数量为2118箱，吴瀛等监运；其中，1054箱于3月5日抵达上海，其余1064箱暂存于南京，后运至上海。第2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3月15日，数量为1290箱，俞同奎等监运，3月21日抵达上海。第3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3月28日，数量为2972箱62包，程星灵等监运，4月5日抵达上海。第4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4月19日，数量为4635箱2包，马衡等监运，4月27日抵达上海。第5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5月15日，数量为2412箱，俞同奎等监运，5月23日抵达上海。以上统计共发出南迁文物13427箱64包。

五批文物从北平运至上海时，共有19492箱72包8件。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外，还有北平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8件、国子监石鼓11箱。

## 二、南京分院成立

初迁到上海的文物，被临时贮藏在两处场所：法租界内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英租界四川路、广州路口的广业公司二楼。这些文物均为精美、珍贵的艺术品，却在黄浦江畔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寄存，不仅容易潮湿生霉，而且周边人烟稠密，常有火警，治安不靖。

## 女性诗词漫谈(七)

### 那些快乐的女孩子

于家慧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中国古代女性多是在“三从四德”“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等传统规训下过着苦乐由人的生活。古代女诗人笔下也多是伤春悲秋、相思怨别之辞。近年来，随着研究者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各种女性文学文献的整理问世，人们才慢慢意识到社会规训、刻板印象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女性文学中也不乏快乐的书写。

李清照就拥有过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她的两首《如梦令》记录了宋代闺秀可以享受到的美好生活：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她可以和女伴出去荡舟玩耍，可以饮酒，可以晚归，可以迟起，与一般印象中必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严守规矩礼节的封建社会妇女形象迥异。其实就是在宋室南渡之后，李清照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愉悦的时刻。作于南渡之后的一首《菩萨蛮》词就有“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这样的句子。更有名的那首《武陵春》，人皆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为写愁的名句，却很少注意到前边的“闻说双溪尚好，也拟泛轻舟”。国已破，家已亡，逝去的不可挽回，可生活还要继续，她是努力想要在辛酸悲苦中给自己寻找一点快乐，才会试着去泛轻舟、赏春色。虽然愁苦仍然是李清照晚年生活的底色，但这种努力寻找快乐的姿态本身就是对苦难的一种抗争。

朱淑真因为所嫁非人而一生抑郁，《断肠集》中却也不全是愁肠和泪眼。她也曾娇憨地流露“不想绣花想去玩”的心情：“斗草寻花正及时，不为容易见芳菲。谁能更觑闲针线，且遣春

光伴卮。”在游戏中尽情享受春光。也曾在清凉的夏日雨后执笔赋诗：“幽篁脱箨绿参差，雨过微风拂面宜。浴罢晚妆慵不御，却亲笔砚赋新诗。”舒适而悠闲。她在《秋日述怀》一诗中写道：“妇人虽软弱，泪不等闲流。我因无好况，挥断五湖秋。”朱淑真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胆倔强的女子，她的伤春悲秋并非无病呻吟，而是真的遇到了无法可解的愁苦之事。

自古以来，后宫女子大多命运不幸，“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仿佛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博得君王的宠爱。可是花蕊夫人的《宫词》百首却描绘了后宫女子形形色色的娱乐生活，她们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奏曲、下棋、骑马、打球、采莲、斗草、打鸟、投壶、钓鱼、斗鸡、捉迷藏……兹举两首，以见一斑：

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

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别浦中。

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

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和睦、很开心，并不像大多数男性诗人所形容的那样，“春风弯镜愁中影，明月羊车梦里声”，日思夜想只有“梦君恩”这件事，也不像一些宫斗剧里那样只有互相倾轧和钩心斗角。

古代女诗人还记录了许多闺中乐事。朱妙端的《染甲》写：“金盘和露捣晴霞，红透纤纤玉笋芽。翠袖笼香理瑶瑟，绿阴初绽海棠花。”将凤仙花捣成汁染指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女孩的童年记忆，古人也有此乐。马如玉的《蹴鞠》云：“腰支袅袅力微微，滚滚红尘拂羽衣。掩月鬓边星独坠，石榴裙底凤双飞。”她们还有踢足球这样看起来一点也不“淑女”的活动，从诗中的描写看，游戏中的动作还相当激烈呢。

当然，她们更多的时候是静处闺中。王微《闲居》诗云：“不妨昨日雨，可喜是晴。窗瞑从云宿，庭虚待月行。闲真唯适俗，静乃合诗情。冬候常如此，将愁何处生。”其实只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但女诗人有一份闲中得趣，爱赏物华的好心情，愁然自然不生。

明代女诗人沈宜修曾感叹“莫作妇人身，贵贱总之愁”，道出了古代女性无论贵贱都身不由命的命运。然而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再如何辛酸悲苦的境遇也不可能笼罩每时每刻。那些快乐的时刻犹如隙缝中的一线天光，给生活以慰藉，给生存以意义。在历史的长卷中，这些女孩子的欢声笑语也是一抹难得的暖色。

存放于南京的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地区疏散，即西迁。其中，南路80箱文物溯江而上，初藏长沙，后取道湘桂公路，辗转于贵阳、安顺，最后迁到四川巴县；中路文物931箱沿江向西而行，初存汉口，中经宜昌转运重庆，又经宜宾转运乐山，密藏于乐山安谷乡；北路文物728箱沿着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然后穿越秦蜀古道，颠沛于汉中、成都，最后迁到峨眉县。上述总计运出的文物有16698箱，还有部分文物滞留南京。上述文物的西迁历程，极其艰难坎坷。

在南路文物疏散的过程中，渡河是常见的交通方式。1944年年底，日军占领黔南重镇独山，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严被迫与家人带着文物从安顺转运到四川。庄严的四儿子庄灵在《故宫文物南迁时代忆往——从〈华严洞图卷〉和〈庄严日记〉谈起》一书中，回忆了他们乘坐的军用卡车是如何渡过乌江的。乌江是长江从贵州到四川段一条较大的支流，为了渡桥，车队请人用木杆搭建了一座狭窄的长桥。这座桥两边完全没有栏杆，宽度比车两边轮胎没宽几尺。除了司机外，差不多所有的人员都要下车，行走在车子后面，以减轻车子的重量。时年6岁的庄灵因为年纪小，和母亲被留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车辆启动，在车外多人的协助和大声呼喊指挥下，司机谨慎地升上桥，在桥上开得非常缓慢。车身因受到重压产生的吱嘎声，庄灵听后感到非常害怕。当他的眼睛往外看时，感觉自己好像“悬浮”在江面上。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车队才渡过乌江。庄灵回忆说，整个渡江的过程终生难忘。

1938年2月，北路文物经过川陕公路时，需翻山越岭，危险重重。时为文物押运负责人之一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运输时的场景，经过悬崖路段时，路况崎岖，部分路面尚未修好，车行极其艰难。那志良却有着乐观的心态：他看到满山盘旋而行的汽车，觉得非常壮观；他看到高山与悬崖之间的风景，觉得甚是好看……到1938年4月10日，7000多箱文物全部被安全运至汉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三处的文物，于1947年2月汇聚至重庆，并于1947年12月由重庆全部运回南京。经过清点，这些文物箱数未少，文物损伤数量很少。1949年2月，2972箱南迁文物自南京被运往台湾，剩下的文物绝大部分于1951年被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 四、文物展览

故宫博物院的先贤在文物南迁过程中，不忘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之责任，举办了多次展览。其中，以参加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最具有代表性。此次展览时间为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地点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伯灵顿馆。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等15个国家的公私机构和个人的展品参展，展品达3000余件。其中，中国参展的文物为786件（从送展的1022件文物中选出），而这些文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故宫博物院在沪的南迁文物。

为准备此次展览，故宫博物院从存沪文物中筛选出735件，其中含铜器60件、瓷器352件、书画170件、缂丝28件、玉器65件、景泰蓝16件、剔红5件、折扇20柄、家具文具19件。这些文物与国内其他精调的文物共1022件，在上海进行了为期4周的预展。1935年6月7日，这1022件文物从上海起航，由英国巡洋舰队巡洋舰萨福克号运送，于7月25日到达英国朴次茅斯港。

时为故宫博物院职员的傅振伦，被公派至伦敦，参与此次展览的展品陈列以及在英国的日常相关事务。他在题为《伦敦中国艺展始末》的文章中说，此次展览的观众人数多，且在当地反响强烈。从人数来看，在14个星期的展览中，观众达42万人，仅次于在此地举办的意大利艺术展。而从当地的反响来看，在展览期间，英国的报纸、杂志几乎天天报道消息、刊载文章，杂志发行专刊、画刊；郭泰祺经营的中国瓷、中国绸缎、茶叶畅销一时；十余家中国餐馆生意极其兴隆；英国皇后还特意定制了“中国蓝”的服装，等等。展览结束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电谢中国方面，说“余等确信此次艺展之伟大成功，对于中英两国之相互尊敬与友谊，必将更有所增进”。

此次在伦敦的展览于1936年3月7日结束。同年3月19日，展览的文物被收拾装入原箱，运至英国伦敦佐治船坞，在那里被装入蓝浦拉号邮船，分为四段由英国驱逐舰护送。5月17日，这批文物抵达上海，再由上海运至南京举办复展，以向公众展示文物完好无恙。1936年6月1日至6月21日，这批文物在南京明志楼展出。至此，此次文物赴英展览全部完成。

在抗日战争期间，故宫的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我国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不仅如此，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之久，迁徙地域之广，任务之艰巨，均为世界之罕见。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伟大贡献。

图1：装有南迁文物的木箱在太和门广场装箱场景。

图2：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外观。

图3：装载文物的木船渡河。

图4：装载文物的车辆驶过千佛岩。

在传统意义上，绩溪也算徽州范围。古徽州一府六县，绩溪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从徽州地区划归宣城地区（今宣城市）。行政区划可以调整，地理位置却无法改变，划归宣城的绩溪，依然距黄山市（即以前的徽州地区）中心城区近而离宣城市中心城区远。

因为名人辈出，绩溪名气不小。慕名来到这里才知道，这只是个小县城，仅十几万人口。县城不大，清爽整洁，抬眼便可见山，也是典型的山区县。

和古徽州其他地方一样，绩溪也有不少知名古村。对我们这些匆匆过客来说，最有名的，是一个叫龙川的村庄。龙川离县城不远，属瀛洲镇。来到这里的游客服务中心，看到上面一块大牌匾很醒目，写着“中国龙川”四个字。一个小小的村落，直接冠上“国字号”，这气势、这底气，不简单。

一个村庄凭什么收门票？因为它成了景区。这样的地方成为景区，仅靠自然条件恐怕是不够的，更多的当然是人文因素。

这里，是胡氏的村庄。绩溪胡氏，群星璀璨。历代以来，从绩溪出去的胡氏名人，无论从政、从商、从学，都不乏巨子。红顶商人胡雪岩，名气够大吧？文化学者胡适，名头响亮吧？至于从政者就更多了，仅在龙川这么一个村庄，就出过明代的胡富、胡宗宪等政治人物。

姓氏大，来源也多。绩溪胡氏分四支，分别是“龙川胡”“金紫胡”“遵义胡”和“明经胡”。其中的“明经胡”，也叫“李改胡”，其祖

## 绩溪名村

李伟明



先是唐末皇帝昭宗李晔的后人。当时朱温叛乱，唐昭宗知道大事不妙，将幼子托付给近侍、婺源人胡三公，让他带回老家避祸。为了掩人耳目，胡三公将孩子改姓胡。据说，胡雪岩、胡适即属于这一支。而“龙川胡”的大本营便是眼前这个村庄了。

村庄沿一条小河而建，两岸叫水街。河岸砌着大青石和花岗岩石，水面清净如镜。如果没有游人，村庄是宁静的。四周是山，景致幽雅。据说，东晋年间在此定居的胡氏始祖胡焱看中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东耸龙峰，西峙凤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蜿蜒而来”。山明水秀，这种宜居之处，谁不喜欢？于是，胡氏族人在这里传了一代又一代，至今将近1700年了。

和徽州某些名气大的传统村落相比，这个村庄的建设本身不算很出彩。如果没有知名人物的支撑，也许，你很容易就把它错过了。沿着水街漫步，直到遇见一座古老的牌坊“奕世尚书坊”，村庄似乎立马厚重起来。这是为明代两位高官胡富和胡宗宪修建的。据介绍，小小的龙川，在宋代以来出过十几名进士。而明代更是它的辉煌期。其时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当中，最有名的是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南京户部尚书的胡富，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的胡宗宪。两人中进士的时间刚好隔了一个甲子，一个户部尚书，一个兵部尚书，所以，牌坊上有“大司徒”“大司马”几个大字显示他们的身份。

胡富是一名清官能吏，有“皖南包拯”之称。回来后我查阅《明史》，在卷一百八十六（列传第七十四）看到他的传，文字不多，但内容很正面。比如说他任福建佥事时，“福宁系囚二百余人，富一讯皆定，图圄顿空”，处理案件很利索。书中还说：“符南蛇围儋州，富与参议刘信往援。贼突至，杀信，富手斩副贼一人，贼乃退。还益兵讨平之。”看来，胡富还是文武双全之才，不仅会指挥打仗，还能亲自杀敌。而他任南京户部尚书时，“南都仓储仅支一年，富在部三载，有六年积”。这位前辈，真是大事小事都能干，让人不服不行。

相比之下，胡宗宪的名气可能比胡富大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是他和海瑞有交集。海瑞的著名事迹之一，就是在浙江淳安县任县令时，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跑到县里为非作歹，海瑞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还“假惺惺”向胡宗宪报告抓到了一名冒充胡公子的坏人。胡宗宪虽然郁闷，但也给海瑞“穿小鞋”。

这事件，因为当年出现在中学课文中，所以知之者众。因为这篇课文，胡宗宪早在我心里留下的是家风不正的负面形象。《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载胡宗宪的事迹，其中评价他“多权术，喜功名”。不必否认，胡宗宪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场能人”，逢迎能力超一流，似乎也不是什么清官，最后的结局有几分悲惨。但从他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难海瑞来看，这个人应该还是有底线的。更何况，历史上的胡宗宪，贡献并不小，他是抗倭功臣，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便是他的部下。至于在那样的体制下该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就是个一言难尽的复杂话题了。

一个村庄能保存400多年前的牌坊，足够让它向游客展示自信。要知道，普通物件，几十年之后可能就无处寻觅了。

走到小河对岸，规模宏大的胡氏宗祠是村里的另一代表建筑。祠堂始建于宋代，后来经过多次修葺。现存的建筑为清代光绪年间重修，用料考究，大气古朴。宗祠文化是一种传统。国人重寻根，这是好事。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好东西才能代代相传。当然，建筑物毕竟是有寿命的，如果没有传承保护意识，它最终还是要回归尘土。怎样才能传承得更久远？名人效应或许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走到村庄尽头，水街之汇入登源河，这是一条更大的河流。河面上，一座新桥耸立，如彩虹卧波。远处，层嶂叠峦。桥下，碧水静谧。夕阳渐偏，四周寂寥。其实，不管在哪里，热闹都是暂时的，喧嚣与宁静交替是常态。在山水间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村庄，对此，想来早已淡然